



## 「景福」傳遞的風範與理想

文／謝博生

今天臺大醫學院為醫學系第四十一屆畢業同學舉辦撥穗典禮，我有機會來參加，並與諸位分享我對「景福傳遞的風範與理想」的一些看法，感到非常榮幸。我首先要向諸位畢業生祝賀你們圓滿完成了在臺大醫學院的學習任務，諸位同學即將要走出臺大醫學院校門（圖1）與1960年代我畢業時走出的校門（圖2）有很大的差別，與100年前1910年代畢業的校友走出的校門（圖3）差別更大。最近我以母院早期畢業校友做為對

象進行了一次人物學習，藉此探討100年前我們的前輩校友呈現出什麼樣的風範？母院依循什麼樣的教育理想而培育出那一世代的醫者？謹提出一些學習心得與諸位同學分享。

我的學習從蒐集母院早期畢業校友在學中的講義手稿開始，希望藉此了解他們當年的學習情況。圖4至6列舉幾位早期前輩校友聽老師講課以後紀錄的手稿，詳細閱讀這些手稿讓我非常感動，百年前的校友們聽完老師講課後，花了好多時間加以整理，然後用



圖1：2010年代的校門



圖2：1960年代的校門



圖3：1910年代的校門



圖4：賴和校友手稿



圖5：張七郎校友手稿



圖6：劉清港校友手稿



毛筆很工整地把老師講課的內容紀錄下來，裝訂成冊。每一堂課的手稿記錄除了老師講授的內容以外，也把老師的名字寫在上面，表達對老師的感激。從他們留下來的講義記錄手稿，我深深感受到早期前輩校友們學習態度的認真，學習的熱忱，對老師的敬仰以及對於學習機會的珍惜。

接著，我的學習活動是實地參訪百年前畢業校友的故居，了解他們的生活、工作、行誼，以及他們獲得的社會評價。早期校友們畢業的時代正是臨床醫學急速發展的關鍵時刻，疫苗接種日漸普及，傷寒霍亂等流行病的病因及預防方法逐步釐清，無菌手術逐漸推廣，但是，由於客觀環境的限制，早期校友們畢業後不容易有機會從事醫學研究，也無法留在母院任教，除了極少數赴日本進修或留學深造以外，幾乎都回到故鄉行醫。校友們在學校中日以繼夜、勤奮學習，畢業後不斷累積臨床經驗，救人無數，深獲病人信任，對民眾健康貢獻卓著，除了執行醫業，許多校友都熱心投入公共事務，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為民眾所頌仰。

## 早期校友的風範

臺大醫學院的前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一屆學生畢業於1902年，由1902年至1915年之間一共有331位學生畢業。這些畢業生分散在台灣各地行醫，不但貢獻於地方民眾的健康，他們在行醫之餘，也秉持關懷社會、熱愛鄉土的情操，投入公益、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建設和發展，啟迪台灣文化，促進現

代化知識普及，做出為台灣社會所頌揚的貢獻，例如黃瑤琨、謝唐山、林清月、張山鍾、施興、林家東（林吉崇教授尊翁）、余祖添（余秀瑛教授尊翁）、杜聰明、賴和、蔣渭水、張七郎等校友。為什麼醫學校早期畢業的校友呈現出這樣一種風範？我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在學校期間接受了很好的人格養成教育薰陶的緣故，以下舉出幾個例子。

賴和校友於1914年由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回到故鄉彰化行醫，被稱呼為「走街先」。台語的“先”是醫生的意思，“走街”的意思是賴和醫師經常帶著診察包，坐著人力車在彰化街頭造訪病家看診（往診）。彰化地區的民眾非常敬佩賴和的醫術和醫德，這位百年前畢業的校友可說是一位「坐著人力車到處往診的全人、全科醫師」，他小孩、大人、老人都看，病人有簡單的婦產科、眼科、耳鼻喉科問題，他也幫忙解決。賴和校友人格高潔，醫術高明，待人親切，求診者絡繹於途。除了醫療服務之外，他對社會公益熱心投入，並以文學創作表現了日治時期台灣的時代精神，被稱為「台灣文學之父」。賴和的鄉親為表達對他的崇敬，在彰化八卦山上興建了一面文學牆命名「賴和牆」，把他作品中的好句子刻在水泥柱上（圖7）。賴和的故居經過改建，四樓現為紀念館，展示他在學當中的資料及畢業後對社會、對文學界貢獻的事蹟。

畢業於1915年的張七郎校友，故鄉原來是新竹，畢業後先到淡水地區行醫，因為受到馬偕博士遠從加拿大到台灣來服務的奉獻精神所感召，志願到偏僻的花蓮鳳林鄉



服務，他以仁心仁術為己任，對病人、對原住民非常好，獲得民眾景仰，聲望很高。事業穩定後，他回到新竹故鄉去號召了一大批的鄉親到花蓮縣墾植開拓，他對於教育特別的重視，自己出錢創辦了一所學校，這所學校經過百年的演變，最初是鳳林農業職業學校，現在成了鳳林國中。鳳林有一種名產，稱為“校長”，由於受到張七郎校友倡導教育所影響，鳳林地區產生了很多熱心教育的中小學校長。這樣一位傑出的醫者，以冒險患難的精神開拓花蓮，對待病人仁心仁術，用心於花蓮子弟教育的扎根，卻在二二八事變中與兩位兒子一起受害。我到鳳林鄉張七郎校友的故居參訪時，在他的書房中看到了他的題字及書櫃（圖8），書櫃裡面存放著張醫師在學當中留下來的筆記手稿，裝訂成17大本，保存的狀況非常良好。我問他女兒為什麼能夠保存得這麼好？她女兒說，父親遇害後，她思念父親，六十多年來幾乎每個月都把父親的手稿拿出來曬太陽，才能保存得這麼好。我請她將父親的筆記手稿捐贈給母院博物館典藏，她不由得流下眼淚，說非

常不捨，因為每天看到這些手稿就像看到父親一樣，實在捨不得捐出來，但是想到自己年齡已經90多歲了，再留著也不知會變成怎樣，所以還是同意捐出來給母院典藏。

### 重視人格養成的教育理想

臺大醫學院最早的前身是1897年台北病院院長山口秀高設立的「醫學講習所」，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於1899年正式成立後，許多制度都是由1902年接任校長的高木友枝所建立的。高木友枝校長為人耿直，待人寬厚，認同台灣，人格崇高，見識廣大，寫得一手好字（圖9）。他對每一屆畢業生都要訓勉：「成為醫師前先成為人」，這句話大家都很熟悉，但其內涵代表什麼？關於這句話，高木友枝校長自己的說明是：「**養成人格為先務，要做醫生之前，必須做成了人，沒有完成的人格，不能盡醫生的責務。**」這就是重視人格養成的教育理想。

高木友枝在擔任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校長之前，曾於1897至1899年在德國柏林大學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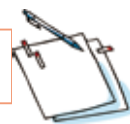


圖7：彰化八卦山上的「賴和牆」



圖8：張七郎校友的題字與書櫃





修。柏林大學是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在19世紀初期創立的，洪堡在1809至1810年擔任普魯士文化與教育部長期間，以新人文主義教育理想為指導，對德國教育體系進行改革。他的教育理想是：最大程度地、均衡地培養“人”的各方面能力，使之成為整體。洪堡強調人格的養成、人性的完善，他主張發展學生的個性，讓學生天生具有的能力儘可能地發展，包括理智的、道德的、美學的能力，讓學生成為有能力、有品德、負責任、能自律的人。這樣的教育理想在德國一直延續至今日。

高木友枝在德國進修期間，受到新人文主義教育理想的薰陶，接任校長之後，就將新人文主義思潮重視人格養成的教育理想引進台灣，對台灣的醫師人才培育發揮了重大的影響。高木友枝非常重視“真正的人”的培養，亦即新人文主義教育理想的實現，他希望用人文主義的理想塑造學生的精神境界。賴和校友曾經寫了一篇文章記述在總督府醫學校的學習情況，賴和在文章中提到，高木友枝校長每星期講授一小時的“修身”課，他不由書本上的文字講解，而是教學生

「活的學問」，例如，談做人處世的道理，談人格的完成，談個性的培養，學生聽他講課興趣盎然，一小時很快就過去了。

高木友枝在校長任內建造的校舍（現今的二號館），由近藤十郎設計，採取後期文藝復興建築樣式，1907年完成西面樓座，1913年完成本館、大講堂及玄關。人文主義是文藝復興運動的指導思想，因此，在我的心目中，這棟文藝復興樣式的建築就是母院重視人格養成的人文主義教育理想的象徵，對於台灣的醫師人才培育具有重大的意義。

1980年代臺大醫學院進行整建，原本預定拆除二號館，改建為國際會議中心，大講堂首先於1982年被拆除，後來因為會議中心之建築經費未獲政府核撥，主體建築才未被拆除，但因長期封閉廢用，殘破損毀，有如廢墟。1995年我接任醫學院院長後，很幸運獲得臺大陳維昭校長、附設醫院戴東原院長及校友們協助，將二號館主體建築保留並整修，1998年2月這棟古蹟建築重新啟用，改稱「醫學人文館」，發揮人文教育功能。文藝復興建築樣式的大講堂（圖10）目前仍然保留一面牆，喚起校友們往日在此上課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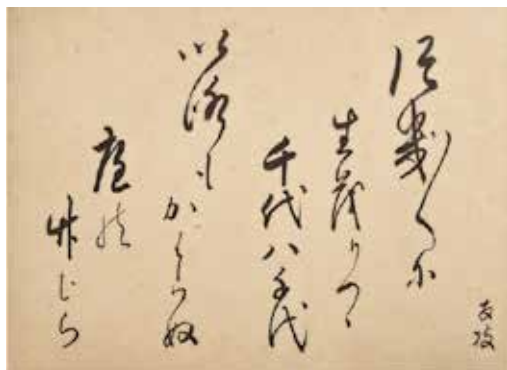


圖9：高木友枝校長的題字



圖10：文藝復興建築樣式的大講堂



高木友枝在德國柏林大學進修時，主要是在醫學校區（Charite）的柯霍（Koch）研究所擔任Wassermann教授的助手，參與科學學術研究。2006年初秋，我專程前往柏林大學醫學校區及柯霍研究所參訪，實地去體會高木友枝百餘年前在此進修獲得的啟發，懷想他在台灣醫師人才培育上的貢獻，對於這一位重視人格養成教育，以至誠為母院塑造良好學風的學者，我從內心產生深深的崇敬。百年來台灣的醫學教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高木友枝重視人格養成的教育理想，一直引導母院的醫師人才培育，我相信這樣的教育理想將會不斷地延續下去。

### 人格養成教育理想的延續

1915年高木友枝卸任校長，由堀內次雄接任。堀內次雄校長也是一位重視人格養成教育的學者，他延續高木友枝校長時代的教育理想，認為一個成功的教育者必須愛護、提攜學生，獲得學生對自己的愛戴和尊敬。堀內次雄擔任母校校長期間長達二十年，跨越總督府醫學校及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兩個階段，培育了不少優秀的醫師人才。畢業於1917年的黃文陶校友（黃伯超前院長的父親）是堀內次雄校長的門生，他畢業後先回故鄉雲林西螺開業，八年後為求醫學與醫術精進，毅然決然地結束醫院業務，攜眷赴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進修，於1932年取得醫學博士學位，是第二位

獲得京都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台籍人士（第一位是杜聰明教授），當時堀內校長送了一個匾額給他，嘉許他求知、求真的精神。這個匾額在今年院慶時由黃伯超前院長送給醫學院典藏（圖11）。

1936年母院升格成為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延攬了許多日本最傑出的教授來任教，小田俊郎教授是其中的一位。小田教授曾在1942年至1944年間擔任台北帝大醫學部部長，戰後留校任教，主持第一內科講座，1947年返回日本擔任大阪市立醫科大學教授暨附屬病院院長。小田俊郎教授是堀內次雄校長的女婿，也是我的老師陳萬裕教授的恩師，我多年追隨陳萬裕教授，從陳教授的言教身教中，我深刻感受到母院由堀內次雄教授至小田俊郎教授，再延續到陳萬裕教授的重視人格養成的人文主義教育理想。

小田俊郎教授於1961年退休住在東京都武藏野市，1974年陳萬裕教授帶我到東京去看他，請他幫忙我在日本進修並攻讀醫學博士學位。當時我請我的故鄉鹿港很有名的一位書法家黃天素先生寫了一副對聯（圖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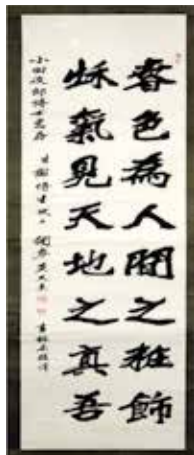


圖11：堀內次雄校長贈送給黃文陶博士的匾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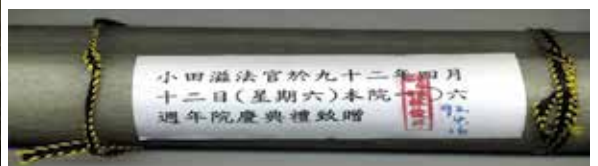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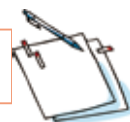


圖12：筆者送給小田俊郎教授的對聯



送給小田俊郎教授，小田教授秉持愛護學生、提攜學生的心意大力幫忙，讓我順利在日本進修，也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小田俊郎教授於1989年過世，他的公子小田滋（在荷蘭海牙擔任國際法庭法官）為了紀念父親，於2003年專程前來台灣，將這副對聯於醫學院106週年院慶時送給醫學院典藏，這種超越時空的情誼，讓我十分感動。

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大學校方接收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將它轉型為臺大醫學院，並指派杜聰明教授擔任第一任院長。杜聰明教授是總督府醫學校高木友枝校長的得意門生，於1914年畢業，畢業後赴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進修，獲藥理學博士後回校任教，是母院的第一位台籍教師。由他接任戰後臺大醫學院第一任院長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它象徵著當年高木友枝校長重視人格養成教育理想的延續。

二次戰後，臺大醫學院的發展大部分是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魏火曜教授擔任院長時期完成的。魏火曜教授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在學中曾經接受很好的人文主義教育理想所薰陶，魏院長經常告誡學生：「要做良醫不要做名醫」。良醫的內涵是什麼？我們每個人心中也許有不一樣的解釋，魏院長自己曾經做過這樣的解釋：「憑良心診治病人，不做不必要的檢查、針藥或開刀……對病人病家做衛生教育，做良醫良師兩兼的好榜樣。」現在院史室中珍藏著魏院長送給陳錦煌校友（1977年畢業）的匾額（圖13），我認為魏院長對學生的諄諄告誡，顯示他是一位重視人格養成的教育家。



圖13：魏火曜院長贈送給陳錦煌校友的匾額

## 結語

以母院早期畢業校友為對象的人物學習，讓我對前輩校友的風範有了更深刻的體會，校友們的風範彰顯出母院百年前樹立的教育理想：重視學生的人格養成與精神境界的塑造，強調人性完善的追求。我認為，這樣的理想源於人文主義教育傳統，此一傳統從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傳遞延續到17世紀的荷蘭，再傳遞延續到19世紀的德國，然後於20世紀初期透過受到此一傳統所薰陶的日本學者高木有枝帶到台灣。高木有枝於校長任內建造的校舍（現今的二號館），採取後期文藝復興建築樣式，象徵著淵源流長的人文主義教育傳統。

母院重視人格養成的人文主義教育理想讓我們有機會跟人類文明、文化發展的幾個最關鍵的時代連結，前輩「景福人」呈現的志業精神、人文胸懷與醫者風範帶給我們珍貴的啟發，我們應該珍視百年來「景福」傳遞的風範與理想，並予以延續、傳承。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7年畢業，現任台灣醫學教育學會名譽理事長、景福基金會董事長）